

迤邐边墙

武陵后生

迤邐边墙



“边墙”即中国南方长城(South-Great Wall),又称苗疆边墙、湘西边墙,由国内长城专家罗哲文命名为“南方长城”,是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境内的明清军事防御体系遗存,属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其主体分布于凤凰、吉首、泸溪、花垣、古丈、保靖等县市,并向周边的麻阳、松桃、铜仁等县市辐射,现存墙体88段,包含营汛、屯堡、关卡等遗址578处。

该长城始建于明永乐三年(1405年),经万历年间吴国仕建成110里边墙。清嘉庆六年(1801年)傅霖扩建屯堡碉卡达1176座,形成以边墙、碉楼为核心的防御体系。这段长城是明清两朝对南方苗族镇抚的产物,涵盖了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多重历史现象,是研究明清边疆治理的重要史料。现存遗存多为清嘉庆时期构筑,2011年以凤凰区域性防御体系名义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。

边墙南起亭子关,北至保靖印山台,绵延190多公里,包含汛堡、哨台、关门等设施,构成分隔民、苗的“边墙体系”。湘西州持续推进苗疆边墙保护与申遗工作,开展遗址考古调查、环境整治及法规制定,凤凰县木江坪镇等地已实施考古勘探。

黔东南武陵山区,横亘于黔、湘、川、鄂四省交界,群峰竞秀、溪谷纵横,自古便是汉、苗、土家等多民族繁衍生息的家园。这片土地的交融史,远比封建王朝的行政区划更早。早在明永乐十一年(1413年)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设立、贵州正式建省之前,各族先民已在山间编织出紧密的共生网络。彼时的“民族边界”,并非冰冷的砖石,而是各族在劳作、节庆与贸易中自然形成的文化过渡带,柔软却坚韧。

然而,这份和平终被封建统治者的贪婪与偏见击碎。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控制力渐强,武陵山区的土地、矿产与林木资源,成为官府与地主觊觎的目标。为掠夺资源,汉族地主以“朝廷赐地”为名,强行圈占苗族世代耕种的河谷梯田与平缓坡地,将苗民驱赶到海拔千米以上、土壤贫瘠的深山;在社会权益上,苗家子弟被剥夺科举资格,不得入官学、不得任官职,甚至连与汉族通婚都被明令禁止;经济上,官府对苗民征收“火坑税”“人头税”等苛捐杂税。

当压迫降临某片土地的时候,反抗的声音便会在哪里响起。据《贵州通志·兵事志》统计,在明朝276年期间,黔东南苗族因不堪压迫发起的起义达30余次,从宣德年间的“腊尔山苗乱”到万历年间的“铜仁苗变”,每一次抗争都在官军的“剿杀”中血流成河,却始终未能熄灭反抗的火种。

眼见“剿而不灭”,统治者转而寻求“隔离之策”。1615年,明廷从湖南凤凰厅至贵州松桃厅,沿武陵山脉主峰修筑一道纵贯黔湘边境的石墙,史称“苗疆边墙”——这便是后世所称“中国南长城”的雏形。边墙以青石垒砌,高约3米、宽2米,沿线设碉卡130余座、哨台200余处,士兵日夜巡逻;官府还在边墙两侧设“禁界”,规定“苗民不得越墙入汉区,汉民不得越墙入苗寨”,试图以砖石分割苗区与汉区,将苗民禁锢在深山之中。可人性的联结,从非砖石所能阻隔。每到深夜,边墙隐蔽的山口总会亮起微光:苗家妇人提着装满天麻、杜仲的竹篮,与驻守边墙的汉族屯丁家眷交换针线、粗粮与盐巴;汉族铁匠会偷偷翻越边墙,为苗寨打造锄头、镰刀,换取苗族的山货;甚至有年轻的苗汉男女,不顾禁令私订终身……这道象征压迫的边墙,反倒成了各族百姓突破官方隔阂的见证,悄悄维系着交融的血脉。

清廷入主中原后,不仅未废除边墙,反而将其升级为“军事隔离体系”。1795年,为镇压日益频繁的黔楚苗民反抗,清廷派按察使傅庸驻节边墙沿线,在明边墙基础上向北延展百余里,西至贵州松桃厅的正大营,东至湖南凤凰厅的喜营,增修屯堡1232座、碉卡数千处,派驻丁勇7000余名。据《楚南苗志》记载,这些设施“关墙界,炮台堵截,哨台瞭望,屯堡聚卫”,其核心目的是“遏苗之来,截苗之归”——既阻止苗民进入汉区谋生,又切断苗寨间的联系,将苗民困死在资源匮乏的深山。傅庸还推行“屯垦制度”,将边墙附近的土地分给屯丁,规定“屯丁无事则耕,有事则战”,形成对苗区的环形包围。可统治者的残酷,终究点燃了更大的反抗火焰。这一次,抗争不再是单

一民族的呐喊,而是苗、汉、土家等各族被压迫人民共同的觉醒。

这场抗争的核心领导者,是松桃厅塘汛大寨寅的苗族首领石柳邓。他生于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自幼随父亲在梯田劳作,亲眼目睹汉族地主强占土地、官兵肆意欺压苗民的场景。成年后,他常往返于苗寨与汉区,深知武陵山区各族百姓的共同困境——汉族佃农受地主盘剥,“岁收粮食十之七归地主”;土家族猎户被官府强征“狩猎税”,“猎获之物需缴三成”;苗族百姓更是“无田可耕、无学可入”,三者的遭遇虽有差异,却同样承受着清廷的压迫。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,石柳邓秘密联络四川、湖北的白莲教信徒(其成员多为汉族、土家族贫苦百姓),又邀约湘西永绥厅(今湖南花垣县)黄瓜寨苗民石三保、乾州厅(今湖南吉首市)平陇寨苗民吴八月、凤凰厅苏麻寨吴半生,以及土家族首领吴廷峰、苗族女英雄石七妹等,在大寨寅的一棵古柏下歃血为盟。盟誓时,苗语、汉语、土家语交织,却只有一句共同的誓言响彻山林:“共抗清廷,还我生路!”他们约定次年正月十八,黔湘川鄂

四省苗寨与反清力量同时起义,以“烽火为号,同步举事”。

意外却提前点燃了烽火。乾隆六十年正月十六,石柳邓在大寨寅训练义军时,被松桃厅都司察觉,300名清军急向义军扑来。面对突发状况,石柳邓沉着指挥:他一面命义军埋伏在清军必经的山谷,一面派人火速通知黔湘各寨“提前起义”。次日清晨,清军进入山谷,义军突然从山林间杀出,清军猝不及防,死伤过半,残部狼狽逃回松桃厅城。

此役过后,石柳邓正式举起“统兵元帅”大旗,提出“驱逐客民,夺还苗地”的口号。这里的“客民”,并非指普通汉族百姓,而是欺压各族人民的地主与官吏,这一精准的定位,避免了民族冲突,为各族联合奠定了基础。

义军随即兵分三路:一路由石柳邓亲自率领,向贵州松桃厅城进攻;一路由石三保带领,奔袭湖南永绥厅;一路由汉族白莲教信徒刘之协引导,直取四川秀山县。短短数日,义军便占领秀山大部,攻入松桃盘石汛。



边墙

在攻取松桃厅城时,湘西义军在石三保、吴八月的率领下星夜驰援,各族勇士冒着清军的炮火攀爬城墙,汉族义军点燃炸药炸开城门,苗族妇女则在后方搭建临时医棚,为义军做饭、包扎伤口。激战三昼夜后,义军终于攻入城内,清军残部退守松桃城外的云落屯——云落屯地势险要,三面环水,一面靠山,清军凭借工事负隅顽抗。义军围城三月,期间始终严守纪律:不抢掠汉族百姓的店铺,不伤害无辜的少数民族家庭,甚至打开清军粮仓,为松桃城内的各族百姓分发粮食。这种跨越民族的信任,让义军迅速壮大,周边的苗、汉、土家百姓纷纷加入,队伍很快发展到5万余人,控制了黔、川、湘、鄂四省13个厅县的广大地区。

面对义军的攻势,清军屡战屡败。义军根据武陵山区的地形,创造出“敌有万兵,我有万山、敌来我去,我去我来”的游击战术:清军大规模进攻时,义军便分散到山林中,利用熟悉的地形伏击;清军撤退时,义军又集中兵力追击,夺取物资。在盘石汛之战中,义军击毙清军副将伊萨纳;黄瓜寨一役,总兵明安图被义军伏击,落马身亡;乾州之战,同知彭凤尧被义军砸死,1400余名清兵见大势已去,纷纷投降。消息传到北京,乾隆皇帝震怒,下令“痛加剿洗,务绝根株”,调集黔、川、湘、鄂、滇五省18万大军,由云贵总督福康安、四川总督和琳率领,向义军根据地发起猛攻。

福康安采用“分进合击”战术,兵分四路向松桃、永绥、乾州、秀山推进,沿途焚毁苗寨,屠杀百姓,试图以恐怖手段瓦解义军。大寨寅失守后,石柳邓为保存实力,决定东进湘西,与石三保、吴八月的义军会合。各族义军并肩作战,在湘西多次重创清军:在永绥厅的腊尔山,义军利用浓雾设伏,击败永州镇总兵苏灵所率清军;在乾州厅的平陇寨,义军击退湖南提督刘君辅的进攻,缴获大量军火。连番失利下,福康安、和琳两位总督竟先后病死于军中。据《清史稿·福康安传》记载,二人皆因“战事不利,忧愤交加”,加上山区瘴气肆虐,最终殒命于军营。

1795年9月13日,为凝聚力量、统一指挥,各路义军在湘西平陇寨召开联席会议。会上,各族首领一致拥戴威望最高的吴八月为“吴王”,石柳邓为“开国将军”,石三保为“护国将军”,石七妹为“超男将军”(“超男”意为“胜过男子的英雄”)。吴八月站在高台之上,手持苗刀,宣布:“我们苗、汉、土家儿女,都是爹娘生养,同受日月照拂,不应受清廷欺压!今日我们同心协力,打到黄河去,让天下百姓都能有田耕、有饭吃、有书读!”台下,各族义军高举兵器,呼声震彻山林。此时的义军,已发展到30余万人,控制了湘黔渝交界的铜仁、松桃、秀山、酉阳等广大地区,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。

然而,胜利的曙光并未长久。清廷见军事镇压难以奏效,便使出阴险的离间计:一方面,派人潜入义军内部,散布“苗族首领要排挤汉族义军,战后只分土地给苗民”“土家族首领吴廷峰私通清军,准备投降”的谣言;另一方面,以高官厚禄引诱义军首领,凤凰厅鸭寨苗寨苗民吴院登被收买后,暗

中向清军传递情报,甚至设计诱擒义军首领。嘉庆元年(1796年)初,吴半生在战斗中因叛徒出卖被俘;同年4月,石三保在前往平陇寨的途中,被吴院登诱至清军包围圈,力战被俘。二人先后被押解京师,在菜市口凌迟处死,消息传来,义军士气大受打击,军心动摇,根据地接连陷落。

1796年末,石柳邓率领残余义军退守贵州松桃石隆寨(今松桃石梁乡),与清军展开最后的决战。清军以十倍兵力围攻,义军凭借山寨的石墙、壕沟坚守月余,多次击退清军进攻。1797年1月,清军采用火攻战术,在山寨周围堆积柴草,点燃后顺风纵火,义军阵地化为一片火海。石柳邓在突围时战死。同年3月,苗族女英雄石七妹在湖南永绥厅的战斗中被俘,面对清军的严刑拷打,她始终坚贞不屈,最终被清军杀害于永绥厅城门口。

石柳邓、石七妹牺牲后,义军余部并未屈服,仍在武陵山区坚持斗争:有的化整为零,在山林间与清军打游击战;有的躲进溶洞,依靠群众接济继续抵抗。直到嘉庆十一年,最后一支义军在贵州铜仁梵净山被清军围剿,首领龙老才战死,这场被称为“乾嘉苗民起义”的抗争才彻底落幕。

这场前后持续12年的起义,是贵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起义之一,也是武陵山区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压迫的光辉史诗。它不仅打破了清廷通过苗疆边墙制造的民族隔离,在血与火的考验中,苗、汉、土家百姓并肩作战,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情谊;更推动了黔东南地区的社会变革。

黔东南的烽烟,促使清廷不得不调整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,废除“赶苗杀业”,允许苗民回原居地耕种,开放部分科举名额给少数民族子弟。而那一道象征压迫的苗疆边墙,在起义中多处被义军摧毁,此后虽有修补,却再也无法阻隔各族人民的交融。如今,边墙的残垣断壁仍屹立在武陵山区,无声诉说着那场改变黔东南命运的抗争,也见证着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密不可分的联结。(图片取自互联网)

本期导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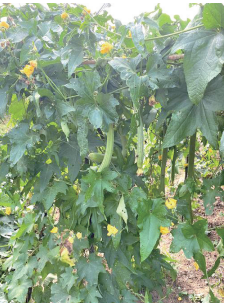
主客体互融的
思维深度阅读



一个人的
精神高地

思版文苑翡翠

菜园子



去上学
提着烘笼
鸽子的
装置艺术



B4版文艺长廊

春到农家



静静的
团结湖
云海深处
何歌飘